

【用文字串联数千年的中国史】
【扎根于历史的纵深】

极简中国史

马东玉◎著



团结出版社

极简中国史

马东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极简中国史 / 马东玉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126-4647-6

I. ①极… II. ①马…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3601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6 开

印 张: 12.5

字 数: 197 千字

印 数: 4045

版 次: 2017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4647-6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极简中国史

中国人把历史看作镜子。“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前面的车子翻倒了，后面的车子要以它为教训，不要也翻倒。所以，大史学家司马光给自己写的一部历史叫《资治通鉴》，即他写的历史是供治国参照的借镜。我国先秦的王朝专设史官，给史官记述真实的权力，连握有生杀大权的天子也不得强行干预。《礼记·王藻》记载：“动则左史书之，定则右史书之。”这里是说，周朝王室的活动都要由“左史”和“右史”两个史官作记录，别人和别的官员无权记录。这说明王朝统治者很重视历史，从中汲取统治经验和教训。

近年来，还有的历史评论家把历史称为“避险秘笈”，认为当今世界是千载难逢的时代，即网络科技时代。千载难逢是机会，而同时也将会遇到大风险。如何抓住机遇，避开风险？“历史，在这个时候就派上大用场。”

我们相信历史有这般神奇的效用，所以用极少的文字给数千年的中国史过滤一番，滤出能让我们抓住机会，避开风险的篇章。

中国古代曾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有着令世界称羡的光辉文明。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产生了古代文明，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失去了古代的辉煌，成了挨打的落后国家？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历史能起到抓住机遇，避开风险的作用吗？

目 录

极简中国史

第一章 给国人永久的智慧和奋斗精神——史前的文明	1
第二章 断裂与继承——夏商西周奴隶制国家	4
第三章 古代文明的灿烂——春秋战国时代	16
第四章 文明的直接后果——秦汉大帝国的诞生	32
第五章 文景之治——汉初与民休息	43
第六章 雄居东方——武帝时汉帝国的鼎盛	48
第七章 北击匈奴——汉武帝的反入侵战争	57
第八章 丝路开通——汉帝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64
第九章 历史的转弯处——说说王莽	69
第十章 豪族腐朽的政权——东汉	81
第十一章 数百年乱世——三国两晋南北朝	92
第十二章 “伟大的暴君”——隋炀帝	104

第十三章	世界文化的中心——大唐帝国	113
第十四章	富裕而文弱的——宋王朝	137
第十五章	蒙古人在中国——元王朝	159
第十六章	腐败而荒唐的——明王朝	171

第一章 给国人永久的智慧和奋斗精神 ——史前的文明

中国主流文化典籍《五经》之一《礼记》《礼运》篇富于情感地介绍人们景仰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鰥、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我们的历史学家皆认为《礼记》介绍的社会是我们国家的原始社会（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第11页），但是如此美好的社会，如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即使当今社会也很难找到。因此，这样美好的社会也只能是儒家追求的理想王国，《礼记》发布三千年后，康有为著《大同书》描述将来的大同社会，还秘不示人。这样说明又过三千年大同社会仍是人们的理想社会，《礼记》写作之前如何能有呢？难道中国社会真倒退到如此地步吗？

《礼记》介绍的社会，其真实性如何我们已难寻觅，那可真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但是，夏、商、周以前的社会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信息，这些信息对国人有何影响，这确是该弄明白的问题。

首先，给国人劳动创造世界的理念，奋斗不息的精神。由于劳动，首先创造了人类自身，让人类脱离动物群体，会制造劳动工具，又发明了生产和生活资料。虽然尚未积累多少物质财富，但因他们创造的精神财富成为创造历史文明不可或缺的条件。

中国史前史留下的精神文明丰富多彩，她们虽多以神话形式存在，但神话对

人类的教育、鼓励、鞭策、启迪，其能量绝不比现实存在差些。例如一部《西游记》影视，演上千百遍，仍然为少儿，乃至每个中国人喜爱的艺术珍品。上古留下的女娲形象，她辛辛苦苦创造了人类，又遇上了“九州裂，四极废；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熋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鸢鸟掇老弱”。女娲在这天崩地裂之时，千辛万苦炼石补天，同水火和猛兽做斗争，终于拯救了人类。这位伟大女性的斗争精神，极大地鼓舞着人类，其影响无法估价。后来诞生的著名文学作品如《西游记》《红楼梦》《封神演义》都有女娲存在。

同女娲相类，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牛郎织女、精卫填海等，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现实中的人，去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做该做的一切。

最让人景仰的是当时实行的民主选举制，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贤能者，能为大众解决困难者才被选出来率领大家去克服困难。《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脾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黄帝做过大众的首领，是因为他发明了服装、舟、车，又率领军队打败侵略者。焱帝作领袖的原因是他“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伏羲氏发明了网罟，又创造了八卦，也曾被选为贤能；蚩尤虽然是侵略的象征，但他发明了金属兵器，才被九黎部落选为领袖的。

《礼记》所述“大同”社会的末端，因治水而产生了领袖人物。众所周知者为禹，禹之父鲧治水不力而被放逐，其子大禹继承父志而治之，终于成功。中国人历代相传，家喻户晓，无不知“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故此做了华夏民族的领袖，成为中国唯一的治水英雄，传说他不仅艰苦卓绝，而且方法正确。其父所以治水不力是方法不对，是用“土掩”；而禹则是疏导加土掩，所以成功。

对大禹治水方法与父亲不同的说法，屈原已提出了疑问，而现代人更准确地指出，氏族公社时的鲧和禹都只能是“水来土掩”，无法做到疏导。原因是氏族部落各占一块土地，只有统一国土，看到西面是高原，东面是大海，才能做到导水流东注，归于大海。再者，历史只言大禹治水也很有问题。不仅大禹，大舜治水的行为更加动人。

尧看到舜既贤且能，顺从民意把帝位让给了他，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

女英嫁给舜。大舜治水，不幸牺牲在苍梧。娥皇、女英二女寻找夫君，边行边涕，以涕挥竹，竹尽斑，亦溺于湘江。屈原作《九歌》祭二女曰“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毛泽东也曾写诗志之：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诗中说的九嶷山，又称九疑山，即大舜牺牲地苍梧山，在今湖南宁远县东南。帝子指大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即屈原笔下的湘夫人。这么美丽动人的故事，后来进入著名的文学作品，让国人为之永久慨叹，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也是湘夫人的化身，同样美丽动人。

而远在西南蜀地，另有治水英雄杜宇、李冰等。李白诗《蜀道难》言古蜀国有蚕丛、鱼凫二帝开国，有五丁力士开山劈道，杜宇治水的故事便发生在鱼凫帝之时。杜宇原为一青年猎人，因治水有了大功鱼凫帝把王位禅让给他，名曰望帝。望帝率国民开荒耕种，让蜀民幸福，死后还化作杜鹃鸟，每年春天鸣叫不已，催促蜀民耕种，莫失农时。

出现在正史和中小学历史教材中的治水英雄李冰，也被一代代传为神话。传说李冰在灌县附近分岷江为两段，解除水害，又使成都大平原得到灌溉和通航，这便是著名的都江堰工程。如此浩大的工程在当时的人工很难完成，于是便出现了神话，李冰和儿子二郎共治蜀水，而二郎又是灌江口的二郎神扬戩，他在《西游记》《封神演义》里都是一个大英雄，是他成为李冰的儿子，帮助治水修筑都江堰。

总之，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夏、商、周之前有个极为美好的“大同”社会，那社会是“天下为公”，人人平等幸福，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领袖是贤能的人民公仆，他们没有任何特权，只会为人民服务，率领大众治理灾害，建设家园，都是值得永久纪念的大英雄。这个文明社会是中国人的理想，是中国梦。历朝历代，直到今天，中国人都为实现这个伟大梦想不懈努力。

第二章 断裂与继承 ——夏商西周奴隶制国家

在圣人行列中占着永久而绝对统治地位的孔子，用乐章比喻大舜时代和西周时代：“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第三》）意思是孔子说到大舜时的乐章是尽美尽善，而论述西周的乐章是尽美而未尽善。孔夫子的意思是大舜做得好，功劳大，威信高，尧便把领导的位子让给了他，舜的时代是尽善尽美的。武王建立的西周也是值得称颂的，但武王之位是通过讨伐商纣夺得的，有战争的血腥，故此美而不善。

孔子仅认为他处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社会政治秩序混乱、君不君臣不臣的乱世，他一生奋斗的终极目标是恢复旧制度。所以，他认为尧、舜、禹、夏、商、周都是最理想的社会，没认清夏商周的社会本质，在我国近现代历史的很长阶段孔子被论为是“奴隶主阶级的反动代表”，是“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由来。

王朝喋血更替

自从夏朝的建立，“选贤与能”的国家政治制度结束了，被一家一氏“家天下”的世袭制度取代。《礼记·礼运篇》接着“大同”往下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被儒家照旧吹捧而力求复辟的夏商周“三代”，就是我国奴隶制历史时期，也是人类社会史上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它的黑暗无需用更多的文字描述，它的第一大特点是无比专制，人群本该是“选贤与能”，贤能者自然做首领。但是，自从大禹把位子传给了他的儿子启，到秦始皇两千多年，再到清末又两千多年，专制皇帝有几个是贤

能的？几岁的幼儿皇帝就产生了一大批，昏庸皇帝、混蛋皇帝更有人在，百官都得跪拜山呼万岁，老百姓都得绝对服从。专制皇帝把“天下为家”，并非把天下子女玉帛当作家人家物那样爱护，而是看成他的私有，想怎么败坏蹂躏就怎么干。为什么中国的官员贪侵那么严重，原因就是数千年的专制制度，皇帝把天下看成个人的，官员就把个人“地盘”里的一切看成自己的，想贪便贪，想拿便拿，那是传统的、自然的。专制制度是官员贪污的根源。

第二大特点是产生了对立的两大人群，即奴隶主和奴隶。提到奴隶一词，再无知幼稚者都知道它的残酷和血腥，有人把奴隶与会说话的工具和牲畜相比较，实质上远比它们要悲惨。工具和牲畜的主人都知爱护它们，而奴隶主根本上就不会爱护奴隶，他们只会随意使用、伤害、杀戮，奴隶主死了还要杀死男女奴隶来殉葬。

大禹传子家天下，本身就充溢着血腥和极度的不公平。

大禹晚年，按照尧舜的制度“选贤与能”，应该由益来继承。根据《史记》《汉书》《书经》等原始记述，益，即伯益，或柏翳，是西方秦的先祖，秦也是东方的一个民族，后迁到了西部。在大舜时，同大禹一起辅佐舜做治水等重要工作。益在治理洪水、驱逐食人畜的猛兽、治侵害人民和农作物的百虫等工作，都成绩卓著。在神话传说中，益同神农氏等英雄一样，说他自身就是“草木鸟兽之长”、是百虫将军。《水经注·洛水》记述：九山神庙有“百虫将军显灵碑”，碑文有：“将军姓伊氏，讳益，字隤改，帝高阳之第二子伯益者也。”

益的贤和能足够继承条件，也被定为继位人，但最终还是被大禹的儿子启夺去了继位权。

启有无贤能继位呢？可以说早期记载他文章皆说他一无是处。如《山海经》开篇记述启在一边自娱，一边观舞。他穿戴着华贵的服饰，手拿羽伞、玉环，坐着三层华盖的宝马香车，敲打着手中的玉环，观看众舞女为他歌舞。《墨子·非乐上》说：“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镗镗，箛磬以方，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是说启放恣淫乐，终日沉湎酒色乐舞，不恤人民，不问国事，连上天都要抛弃不再保佑他。屈原在《离骚》中记述：“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夫家巷。”是说他放纵淫乐，不顾国家人民的艰难，更不思进取。他的五个儿子都跟他学坏，争夺帝位，发生自相残杀的内乱。

益和启二人的贤能相差甚远，大禹也不好太过格，只得顺着民意和事实，决定把位子让给益而只让启做吏。《战国策·燕策》说：“禹将益而以启而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友党攻益而之天下。”启以暴力杀害了益，夺取了帝位。

儒家们以既成事实的皇统为原则，多维护启继位事实。孔子对益和启未加评述，而孟子在没有历史根据的前提下说：“禹荐益子灭，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孟子·万章上》）孟子是说，大禹是要把帝位传给益的，但是百官不拥护益而拥护启，所以启才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帝位。孟子既说大禹按传贤的制度传位于益，而启夺得继承权则是百官不支持益，启的父子都是按“天”之意行事，“大人世及以为礼”，是说“天下为家”，父子代代相传成了固定不变的制度，完全是天意。因此《竹书纪年》（古本）就直截了当地说：“益干启位，启杀之。”

既然启以武力破坏了“传贤”制度，以兵革夺取政权，以后也如《礼记·礼运篇》所说，从此以后阴谋夺权和武力夺权的事便不断发生，“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启荒淫放恣，不恤国事，他的儿子也一样荒淫，太康在内訾中夺得继承权，由于他的更加“娱以自纵”，东方新发展起来的有穷氏首领后羿（非射九日的羿），见有机可乘，趁太康出猎时，便起兵攻占了夏都，夺取了夏的政权，此即史书上说的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太康逃亡，死在外地。后羿相继以其子仲康和仲康子相为傀儡，把持政权。之后后羿的亲信寒浞谋杀了后羿，夺取夏政权。而相的妻子在丈夫被杀的宫廷混战中逃亡，在娘家有仍氏那里生下遗腹子少康。成长过程中的少康又逃亡至有虞氏部落，有虞氏给他土地和军队，并以二女妻之，还争取友邻部落及夏朝的旧臣和大众。准备充分后出兵进攻寒浞，终于攻灭了寒浞阵营，恢复了夏的统治。

夏王朝自启杀益即以战乱立国，经过后羿和寒浞，半个多世纪一直混战不已。直到少康之子杼继位，又出兵征“东夷”各部落，多取得胜利，使夏政权巩固。夏王朝如果自大禹开始，到夏桀灭亡，共有十七君，历时471年（《竹书纪年》）。夏王朝的统治和活动区域是现在的山西南部、河南和山东、河北的交界一带。

由于夏王朝距现代久远，国域狭小，后世甚至怀疑有此王朝存在。但是，周朝以后的文献无不记有夏商的史迹，《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

后之世。”诸多诗文的记述，证明夏的存在不容怀疑。

奴隶社会的君主皆毫无约束和节制，皆庸者有之而少英明。夏朝最后的四个君主一个比一个淫昏强暴，《国语·周语》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妇方鬼神事，淫乱”，孔甲之后四世是履癸即著名的暴君夏桀，他荒淫失德，大兴土木，四方用兵，伤国害民。弄得百姓无法生存时，大家指着上苍诅咒他：“你这个太阳快点完蛋吧，我们情愿同你一起死亡！”不久，便被商的首领成汤打败，夏朝灭亡。

商族居于河南东部、山东及渤海沿岸。传说其始祖契，是一个名曰简狄的女子吞食鸟蛋而生之，《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反映了商族的图腾是燕子，契生之前是母系社会，契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曾是与尧舜禹并列的部落，也曾参与治水，发展农业，据说是商的先民发明了用牛马拉车。

夏桀无道失去民心，商汤开始了灭夏的行动。商汤先翦灭夏的属族葛、荆、温、韦、顾、昆吾，即今天的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地区。夏桀曾企图联合有缙等族抗击商汤，结果有缙部叛离，夏桀兴师向有缙问罪，商汤乘机大举攻桀。桀败而逃到鸣条，被汤活捉，把他流放到南巢（今安徽巢县），后死于亭山（今安徽和县）。

成汤灭夏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或说都于西亳（今河南偃师）。自成汤至商纣，共传十七代，三十一王，历时六百余年，或说496年（《竹书纪年》）。其统治区域较夏扩大了很多，大约是河南向东至海，陕西向南至长江，山东向北至燕山，是世界上的奴隶大国。

商朝建国后和夏朝一样，很长一段混乱，不断发生王位争夺战。成汤立国后的王位继承取“兄终弟及”制，即以兄传弟，只有最小的弟弟死后才由长兄子继位。商汤在位年久，死时长子太丁已死，先后由其弟外丙、仲壬继位。此时的大权为伊尹掌控，外丙、仲壬在位很短，死后应由太丁子太甲继位，但伊尹则把太甲放逐囚禁，自立为王，统治七年。太甲在贵族的拥护下回到王城杀了伊尹，恢复王位。但继位问题没有解决，“兄弟相承”和“父子相承”你死我活地演争不休。因商王朝内部矛盾，周边部落乘机进袭，东方的兰夷、班方多次袭击商朝，使商的力量大为削弱。一直闹到第二十王盘庚，为了摆脱矛盾，曾采取大迁都措施，把都城迁至殷（今河南安阳），才扭转了大混乱的局面。到第二十三王武丁

时，他“修政行德”，使“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史记·殷本纪》）国内相对安定后则对侵犯商的周边方国，进行了讨伐。先后大败土方、孟方、基方，用三年时间打败强大的鬼方。其统治地有河南全部，山东、河北、辽宁、山西、陕西、湖北，安徽大部，江南和内蒙古的部分区域也为商控制。

然而，奴隶主的野蛮和专制者的贪婪，正好把反侵略战争变成了侵略周边民族和部落的战争。武丁以后的几个王不断发动掠夺奴隶和财产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阶级矛盾尖锐化。至商朝最后一个帝王纣，尤为贪婪残暴，“牧狗马奇物，充仞官室”，“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史记·殷本纪》），昼夜聚饮狂欢。关于商纣王的残暴，国人妇孺无不知之，而且其恶之多达“七十事”（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见《古史讨论集》），其洋洋大观，实中国恶暴之君的典型。《论语·子张》载：“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就是说纣这个奴隶主暴君，他恶到天下人把罪恶全加到他身上。至于《封神演义》又神乎其神地描绘纣王酒池糟丘，脯林肉圃，宫中九市，牛饮三千，丘鸣鬼哭，山走石泣，以人食兽，炮烙为刑，宠嬖妲己，杀忠臣比干，信崇侯虎等恶人。

纣王的下场比夏桀还要惨，周兴起后武王率戎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人，并联合十余部落，在商都朝歌附近的牧野（今河北省汲县北）与纣王军队大战。纣王之军人数虽多，但多是奴隶和贫民组成，在周兵攻来时以为遇到了救星，乃倒戈攻纣王，只在夏历正月初五的一个早晨就把纣王的军队粉碎，纣王乃自焚而亡，商朝随之灭亡。

周是陕甘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民族，始祖后稷是为大众歌颂的神话人物，即农业神。神话说其母姜源出野践大人足，感而生之，出生后就如神话中的哪吒那样，是个肉球，以为不祥而把他丢弃，结果牲畜不践，飞鸟保护，母亲又把他收养成长，取名弃。弃在儿童时便热爱农业劳动，更能动脑研究良种，游戏中便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谷物、瓜豆。长大后把优良品种推广到大众中，并教民种植。

《诗经》里有几篇是歌颂后稷的，如《大雅·生民》等把后稷比喻为养活百姓的天神。尧把后稷聘为农师。早期周族值得纪念的还有公刘、亶父，二位都是领导周族发展农业生产，选择定居地点，关系周族生存的重要领袖人物。亶父率周族迁至陕西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开始建城设邑，并设官置司，慢慢强大起来，

并与商发生关系，向商称臣，帮助商讨伐鬼方，奭父被封为候。奭女死，子季历立，成为渭水流域强盛的部落，引起商的不安，商王文丁杀掉了季历（《左传》昭公七年）。季历死后，子昌立，即文王。周文王又是一个中国后人传颂的人物，神话、传说和历史交织，但不管哪种都写得他很了不起。文王一方面注意和商的关系，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个人就是个身先百姓的领袖，穿着“卑服”，从早到晚在田里劳作。同时又发动一系列开拓疆土的战争，灭掉商的亲信崇侯虎，把国都迁于丰（今陕西长安县），为周灭商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文王死后，其子武王在另一位神话中人物姜太公（或称吕尚、吕望、师望、姜子牙、太公涓等名，是《封神演义》中主角）的帮助下，发动伐商战争，取得胜利后建立周朝。

周的建立，史书把周武王算作第一代王。这个奴隶制国家建立之初和夏、商一样不稳定，武王在建国两年就死了，子成王诵继位，因为年幼便由武王弟周公旦掌握政权。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对周公旦不满，竟勾结商纣王子武庚发动叛乱。叛军势力很大，有商的残余，周分化出的力量，还有徐、奄、薄姑、熊盈等方国的参加。周公率兵东征，又经三年的残酷战争才打败叛军，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这才让成王诵亲政。

中国和欧洲的奴隶制何以大相径庭

历史悠久的国家大都经过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而各阶段的政治制度性质和内容也基本一致。而中国自奴隶社会开始，与西方国家相比较，就大不一样，有其特殊性，直到今天我们建设的也还称作“特色社会主义”。或许，中国自原始公社制就已经具有了“特色”，一直对以后的历史和今天的社会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欧洲史的研究专家大都注意了这一问题，并进行阐述。中国与欧洲同是奴隶制国家时，其最大的不同是欧洲奴隶制国家存在着民主的内容，奴隶也有奴隶的民主权力，甚至可以做官。而奴隶主从君王到官员也要通过一定的民主产生，君王也得选举才能登上统治宝座，这些在中国夏、商、周奴隶制度下，是绝对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思议的。

例如雅典的奴隶制度下，奴隶主和奴隶并肩劳动。国家的宏伟建筑都是自由

公民和奴隶共同劳动建造起来的，他们在一个工地劳动，干一样的活，领同样的工资。法律规定主人不许任意殴打奴隶，更不许伤害他们。古希腊的大学者柏拉图、色诺芬都批评、指责雅典放纵奴隶的法律和行为。嘲笑那里的奴隶主和奴隶一样自由，奴隶主和奴隶穿同样的服装，做一样的工作，奴隶不给主人让路，在大街上根本无法区别奴隶和自由人（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1页。色诺芬：《雅典政治》，罗依卜古典丛书，第一章第十节。）自由主义思想家K·波普则认为“雅典民主”已非常接近于奴隶制的废除（K·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伦敦，1984年，第18页）。

雅典的奴隶还担任低级行政长官，如警察，从事档案管理、维护会场秩序、逮捕犯人、清理死尸等工作，由国家付给工资，可以自由择居等。

罗马历史上曾经有过“王政”时代，先后有七个王统治古罗马，所处时代相当于我国周王朝（古罗马“王政”时代是公元前753年至公元前510年），是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初始阶段。罗马的“王”相当于我国夏、商、周奴隶主国王，他们的“王”与夏商周朝“王”根本不同，前者是由元老院和库里亚大会（即人民大会）投票选出的，没有世袭权；而后者则是“天下为家”夺取的，有绝对的世袭权。罗马的选举式王政仍然为人民不相容，尤其最后一个王塔克文实行专制统治，无视人民大会和元老院的权力，从而激起人民的反抗。公元前510年，塔克文的专制统治被推翻，人民大会剥夺了他的权力，把他和他的全家人逐出罗马。

鉴于塔克文的专制，罗马人发誓不再选举王，甚至连王（Rex）这个词也成为罗马人最痛恨的字眼，此后任何人再搞专制都被宣布为罪恶，要以死刑惩处。

王权被倾覆，罗马人在人民大会上选出两个行政长官作为国家首脑，他们任职期限只有一年，期满后就成为普通公民，或可以进入元老院。罗马史研究专家李维认为，罗马人废除王权世袭，限定行政长官制任期，是罗马人“自由的开端”（李维：《罗马史》第2卷，第8节）。

公元1世纪，日耳曼人出现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而且由氏族部落进入到奴隶社会。此时的日耳曼民族较文明已久的罗马帝国，是相当原始和野蛮的，然而日耳曼贵族对他们以征服取得的奴隶却是相当温和。被征服的外族奴隶都有自己的家庭，有妻子儿女，有房屋和土地，他们只是向主人交纳租税和服劳役。奴隶很少被殴打，都不是主人有意所为，多是出于暴怒的偶发事件。（塔西佗：《日

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7、63页。）日耳曼人的王也是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的，他们只有自己的法律，只是没有文字条文，而是口耳相传的“习惯法”。其法律体系中，法律属于民众，人民的同意是法律有效的。他们的法律不是统治者制造出来的，不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法律在久远的年代已存在人们的风俗习惯之中，是被大众回忆和口头相传产生的。法律超越王权，国王也要绝对服从法律。中世纪开始，日耳曼统治者颁布成文法，是把法律看作古已存在的人民习惯的回忆记录，以人民的名义予以公布。

同样是奴隶制，欧洲和中国为什么会如此不同，许多欧洲史的研究专家都关注这一重要问题，寻找正确答案。比较集中的意见认为早在奴隶制国家产生之前，它们不同原因就产生了。中国的夏奴隶制和商、周奴隶制国家都是由一姓一家取得统治权后，破坏了民族公社的“选贤与能”制，血缘家族的首领，即家长成为国王，一家代代世袭“家天下”。没有法律可言，一家或多家联合执政，多家服从一家，一家之长是占有绝对统治权的天子，毫无民主可言。

而欧洲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以古希腊为例。他们的奴隶制国家称城邦（Polis），城邦国家也经过氏族部落冲突和掠夺战争等过程，逐步形成了国家。城邦国家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移民城邦，即希腊人从公元前8世纪，经两百多年的移民战争，迁移至地中海各岛，甚至远达黑海沿岸及法国、西班牙沿海地带。这些移民进入新地区之后，很快由原来的移民团首领或新选的领袖组织成殖民地国家，建立王城、卫城、居民区，有序地分配土地和奴隶，建立政制、法律、宗教体系。

移民城邦因跨海大迁徙和殖民战争，原有的血缘关系被淡化或破坏，被战友关系、伙伴关系、同盟关系取代。著名欧洲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希腊的海外移民土地上，是根据法律和地区的原则，而不是根据血缘组织原则建立的国家，“在这样建立的海外城市国家里，新的政治组织‘细胞’应该是船队，而不是血族。他们在海洋上‘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土地，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还要和在船上一样，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靠的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上册，第132页）。

第二类是种族征服，即地区的不同种族战争，征服者以军事集团打败另一种族，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或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自由民。征服者时刻准备镇